

王海光 著

时过境未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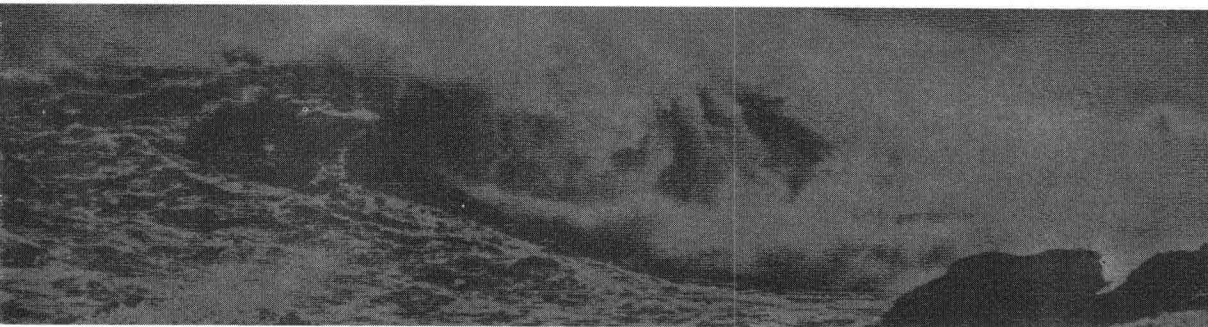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史采薇

从实证主义的客观研究出发，由点及面，重建中国当代史知识体系，用科学探求真相，用理性找寻历史。

评判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的，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时过境未迁

——中国当代史采薇

王海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王海光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220-09101-8

I. ①时…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
—文集 IV. ①K2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4073 号

SHIGUO JINGWEIQIAN ZHONGGUO DANGDAISHI CAIWEI

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

王海光 著

责任编辑	周 颖 唐海涛
封面设计	陆红强
版式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何秀兰
责任印制	王 俊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ichuan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7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7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25
字 数	325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9101-8
定 价	40.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序 一

采薇者的守望

这本《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是王海光教授的论文集，收录了他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若干作品。海光和我同行，更是挚友。他嘱我作序，于情于理皆不容辞。

与海光相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王年一、张天荣两位教授领衔编撰《“文化大革命”词典》，北大、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一些地方高校、党校的青年教研人员参与其事。海光在党校党史部，我在党史研究室，都是撰稿人，就这么认识了。虽然单位比邻，又是同行，也只是偶有交流，来往并不多。90年代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次被人陷害的遭遇。那次遭遇不值一提，却一下加深了彼此的友谊。2001年我调到党校，与海光成了同事，“患难”之谊加相投的意气，遂结莫逆。

海光长我四岁，当受尊重，但更让我钦佩的是他的学问。很早就读过他一些研究“文革”史的著述，知道他治“文革”史功力颇深。他不是那种以大量档案揭秘还原事实的学者，而长于思辨和分析。这一点初识他时我不了解。1996年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一如书名，这是一本纯粹理论性质的著作，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和解释理论，包括社会动荡中的心理与文化、社会动乱的因源和历史运动的变迁形态、能量、动员、民众行为、组织行为、人格塑造、谋略和效应等等问题。海光在后记中说，所写是他“从学以来的一些思想感触点”。他治历史，注意在具象复原事实的基础上，抽象分析事实背后更深层

的东西，把“思想感触点”串连起来，形成认知体系。初读此书，我有些意外。在党史界，那些平庸之作不必说了，即便上乘之作也是叙述性专著居多，充满理论色彩的著作鲜见。这本书在党史圈内的反响似乎不大，却在圈外受到注意和好评，而我一直视其为海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他善于理论思维的印象也是从这本书开始留下的。

海光善于理论思维，不等于说他只是说理和议论，相反，他同样重视考据和叙述。集子里那篇考证匿名反“文革”传单的文章，考证之细腻，推理之严谨，堪称佳作，足见他实证的功力。史家治史历来有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传统。考据之学，重史料，求细末，长于“工笔”描述；义理之学，重史论，观大局，长于“写意”分析。两种传统本无高下之分，各有千秋而已。史学是实学而非玄学，无论哪种风格，途殊而理一，都是以追求本真为目的。于学者而言，两者结合，达于平衡，当然理想；旨趣各异，风格多样，也很正常，不必亦不可能强求宗一。依我看，海光的研究是“两者结合达于平衡”了的，当属理想境界。

近年来，海光的研究更多转向了当代史。党史和当代史是交叉关系，有些问题重叠，有些问题分殊。中国大陆的当代史研究，以研究者分，至少有两个群体，一个是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另一个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前者采用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新文化学的方法，学术理念、问题意识、叙事方式、学科话语与后者殊异。比如，在党史领域，高层决策是重点，宏大叙事为基本模式，上层和精英居“庙堂”之高，底层和草根处“江湖”以远；在当代史领域，情形恰好倒过来，底层和草根是关注重点，以微观和个案为研究路径。党史研究传统模式只关注高层和领袖的缺陷，在前述当代史研究的冲击下显露无遗。如果把政策和制度当作一个系统，政策和制度的出台是输入，实施的过程是输出，实施的结果就是终端；这个终端在社会、在底层，政策和制度的实施效果，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底层才能反映出来。仅仅关注高层决策，忽略底层反馈，历史终究是残缺的。从党史转向当代史的研究者受其影响，亦将目光下沉，开始关注社会、关注底层，重视微观和个案。海

光转向当代史领域后，就做了若干底层和个案的研究。

户籍制度问题在党史界几乎无人问津，迄今也还处于边缘的地位。但1949年以来，最关切国民利益和日常生活的恰好是这一类制度设计（还有基本生活品定量供应、住房、福利、就医、招工、升学、提干等等），它们不仅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的演变亦影响重大。对国民普遍产生“常态”化影响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在以往的党史、当代史研究中无一席之地。海光是党史界最早注意到户籍制度问题的学者，条分缕析地梳理了1949年之后户籍制度的确立过程，指出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新政权接管城市之初的政治控制演变为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控制^①。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确立后，并没有按照计划经济的理性逻辑实现工业化的人口有序转移，反而因为“大跃进”运动的骤起骤落，在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加倍强化了户籍管理的制度刚性，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和流动。众所周知，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是农业人口即第一产业人口向工业即第二产业转移，但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却恰恰限制甚至阻滞了这种转移。这里揭示了一个悖论：从工业化出发确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出了逆工业化的结果。这可能是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种特殊情形，而这个特殊情形的生成，海光认为主要缘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和短缺经济的现实。模式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拉拽了户籍制度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正向力量，国家和社会都不得不面对工业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尴尬。他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以此作过专题报告，颇受好评；发表的论文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如果说户籍制度的研究还是学术目光的平移——从传统的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转到边缘问题，那么，《1957年整风鸣放中的民瘼輿情》一篇，则是学术目光的下沉：从高层转到底层，从精英转到草根。1957年的整风反右，是党史、当代史的热门话题，一般研究者大多关注高层决策、精英遭

^① 王海光：《从政治控制到社会控制：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中国当代史研究》第2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遇。海光不然，他注意到了另一个层面——社会和民间。1957年，除了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发表各种言论外，底层的基层干部、农民、职工、市民、小商小贩同样表达了对政府的意见。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不少人生活水准不升反降。出于生活感受，民众的话题大多是粮食、物价、供应、收入、工资、就业、就医、福利等等。海光利用浙江、河南、天津、山东、江西、大连等地整风办公室的材料，再现了当年的社会舆论状况。在海光看来，以民众运动起家的中共领导人，对来自民间的舆论可能更为敏感，担心民众借机闹事；整风运动之所以转向反右运动，这也许是比较精英言论更为重要的一个社会背景。研究反右的著述不少，却很少有人对底层做研究。海光“另辟蹊径”，从这个层面对反右的历史作了新的发掘。

海光和我有个“廉价”的发现，只要做底层、个案的研究，结论往往都会修正甚至颠覆宏大叙事。他发表过两篇论文——《征粮、民变与“匪乱”》^①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调整》^②，都是做底层和个案的研究。前一篇依据贵州地方档案文献，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南地区的高额粮赋，对已被国民党政府征过粮赋的农民来说不堪负担，一些干部的强迫命令更使农民怨声载道，西南各地因而普遍发生民变。民变被视为“匪乱”，遭到强力平息。其实“匪乱”的主体多是当地农民，不少还是曾经配合解放大军进军西南的农民游杂武装。后一篇仍是依据贵州地方档案，考察了1956年贵州麻山地区“闹皇帝”事件，事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合作化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急推进和统购统销的实施，引发民众不满，终至武装骚乱。地方政府始以武力高压，继在高层调整民族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政治和和平的方式平息了骚乱。两则个案的研究，最大意义在于揭示出政策与“匪乱”和民变之间的关系，对乡村基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重新作了诠释。

① 载《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36页。

② 载《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

当然，党史领域的传统话题，也还是海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高饶事件的讨论即是一例，写有解读高饶事件起因的《政争和权争》一文^①。本集收集的是他对林蕴晖教授新著的一篇评论，林根据新披露的史料（包括回忆史料），重新梳理高饶事件的来龙去脉，澄清了许多真相。海光的评论，则对事件的背景作了新的诠释。高饶事件是1949年以后中共高层第一轮政治斗争，官方对它有过三次正式定性（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69年4月中共九大、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除了九大，其余两次都归结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学界一般也据此认定，高饶事件是权力斗争。今天看来，原有的结论把事件背景简单化了，事实上它不是单一的权争，更有政争的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改变新民主主义设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体制方面撤销大行政区分级，改变为一元化领导体制。战略转轨和体制变动过程中的分歧，再加上历史上积累的矛盾，引发了这一轮高层政治斗争。它不是一次简单的个人觊觎更高权位的角逐，而是一系列理念的分歧、体制变动之后的紧张，再叠加被激活的历史恩怨纠葛之后的冲突。海光把这些冲突、矛盾概括为：法理层面的冲突、战略和策略的冲突、理论与现实的冲突、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冲突和苏区党人与白区党人的嫌隙、地方削权与中央分权后的非均衡矛盾、毛泽东“一线”和“二线”的考量，等等。这是我所见对高饶事件背景最有深度和最为立体的诠释，在观察视野和分析手段方面具有方法论意义。

说到方法论，这本集子里关于当代史研究的几篇论文，在我看来最有分量。这些论文分别讨论了当代史研究的现状、理念、方法等问题，表达了治当代史的学术主张。研究党史、当代史，我与海光的风格有些不同，我比较重实证、重描述，他则既重实证亦重思辨；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我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对当代史研究的现状，对当代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我们有许多共识或共鸣。

^① 载《领导者》2009年第26期。

以学科论，中国当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与古代史、近代史同属一个谱系。因为它最晚近，学术研究起步也最晚，是中国史学科里最“年轻”的分支。中国当代史迄今历六十四年。前三十年来，用海光的话说是“有史无学”。当代史作为学科，尚无成熟的体系，与其他中国史分支根本无法比肩，海光的说法是当代史还很“幼稚”。一个学科从幼稚走向成熟，确立起体系，首先要有经过沉淀、相对认同、含量丰富的知识作基础。当代史目前尚缺乏这样的基础，现有的当代史知识不仅单薄，而且不少是曲解或虚构的。

当代史距今天最近。克罗齐说：“‘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①可见其与今天的关联之密切。唯其关联密切，它的研究便不能不受到当下诸多因素的左右和影响，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人事关系乃至功利追逐对它的“干涉”。在历史学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分支比当代史分支受到的现实制约更多。海光用一句变形的成语“时过境未迁”，概括了当代史研究的困境：“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当代史是刚刚走入公共空间，又还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冷却下来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是近距离的关系：事情虽属历史，但当事人和当事人亲属还在，社会影响还在，政治语境还没有变化。‘时过境未迁’。当代史的言说环境，要受到来自现实社会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冲突，也有现实与历史的恩怨纠葛。所以，当代史研究既不同于已经与现实拉远了距离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现实社会问题的零距离研究，但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绝不亚于这两者，甚至还要更难一些。”（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上述情境下，现有的当代史知识残缺不全且谬说充斥。欲建立当代史体系，须先重建当代史知识。所谓“重建”，包括淘汰伪知和填充真知两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1页。

个方面。无论淘汰伪知还是填充真知，都以还原事实为前提。事实无法还原，当代史的知识体系要么建构不起来，要么只会建在“沙滩上”（杨奎松语）。还原事实和解读事实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要求，不能还原事实，解读就会变成误读。按理说，当代史距今天最近，事实的还原应该比古代史、近代史更有条件。但当代史学术实践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实政治的约束、官方档案的规制，给还原事实制造了极大障碍；而当事人的“选择性”误记和失忆，时下某些“商业化作家”的编造、炒作，同样给还原事实造成诸多困扰。海光痛感，当下的当代史研究“现实与历史、政治与学术、虚构与真相、传说与事实都混合在一起，泡沫泛滥，面目模糊”（王海光：《磨洗与重构——漫论中国当代史的治史》）。对当代史研究来说，还原事实的工作要比历史学科的其他分支更为繁重和艰巨。

海光认为，“历史叙述是社会公共领域的事情”（《时过境未迁》）。他多次说，历史是“公器”。“公器”者，社会公共资源也。既是公共资源，即不能为任何个人、群体或集团所私有，亦不能以任何个人、群体或集团所带的偏见去利用，而须以公正、持平的态度发掘而忌褊狭、极端。历史学求真的本质也规定，历史的叙述必须客观、平实，不可带有个人爱憎、好恶。“公器”的功能和学科的性质，都要求研究者秉持不偏不倚的中立价值观。历史的复原终究是“选择性记忆”，史实繁复杂芜，史料浩如烟海，仅从技术上说，研究者既不可能穷尽，更不可能完全复制，只能通过筛选来建构历史叙述。而建构的历史叙述是否客观、真实，除了研究者个人的治史功力外，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唐朝刘知几概括史家需具备才、学、识三长，清朝章学诚以“史德”作了补充。这个补充至关重要：德性好，不一定做出好的学问；而德性差，是一定做不出好的学问来的。“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而“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人不可能没有情感，研究者亦然，但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植入爱憎、好恶，则可能将有偏见的历史知识带入公共领域，“似公而实逞

于私”，“害义而违道”。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害义而违道”的教训太多。很长时间里，历史被要求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文革”时期竟至变成“斗争工具”、“帮派棍子”，历史任由歪曲、编造、切割和掩盖。一部党史曲解成“路线斗争史”，一部中国史也被曲解为“儒法斗争史”，历史学伤痕累累，“体无完肤”。殷鉴不远，许多人却并未接受教训，还是没有跳出极端价值立场的窠臼。一些人力图维护作为“政治工具”的史学，另一些人则落入了“新两条路线”模式的陷阱，依然把当代史诠释成“两条路线”斗争史，唯一不同的，是从一极跳到了另一极，将“正确路线”的代表和“错误路线”的代表倒置过来。其实历史活动中的人，无论高层人物还是普罗大众，心理、言论和行为都是复杂和多变的，很难对其言行作整体性、共时性的定论，把此岸和彼岸截然划分开来；言此而行彼，言彼而行此，思此而言彼，思彼而言此，行彼而思此，行此而思彼，此一时彼一时，倒更可能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以“两极”思维描述历史固然简单，却恰恰过滤掉了历史的复杂性，导致历史失真。

海光就以历史人物的评价为例，批评了当代史研究的“两极”现象：“与‘为尊者讳’的传统史学陋习相比，神鬼史观是一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把褒扬的正面人物神圣化，把贬损的反面人物妖魔化，更具有极端道德化的绝对色彩，是阶级斗争史观的极致表现。”他分析：“这种思维方式脱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阶级斗争中，把自己作为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把对手作为邪恶和悖谬的象征，可以塑造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助于进行革命动员。”（《磨洗与重构》）往前追溯，“两极”现象还有更久远的历史渊源。“两极”现象同他所指的功利主义史观相联系，当出于某种目的臧否人物时，必然对历史人物作脸谱化描述。而功利主义史观又源于“经世致用”的传统，一旦历史学当作“工具”，服务于某种权力（遑论私利）时，势必会按照权力（或私利）的逻辑剪裁甚至编造历史。作为“公器”，其“公”不存。海光借梁启超的话批评历史学的“工具论”，一语中的：“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

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本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还原已逝过程的本真，修复残缺或遗漏的原貌，澄清不实或歪曲的谬说，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才能予公众公平。若以某种倾向性价值立场或心理情绪，凭着好恶取舍史料，剪裁或曲解史实，这样的“历史”除了贻害公众和社会，他无意义。

研究历史，都有一定的史观作指导。海光亦强调史观之于当代史研究的意义。不同的历史研究者，史观亦不同。学界有人概括了若干史观：阶级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英雄史观、民众史观、正统史观、社会史观、个人历史观等等。各种史观均从不同视角考察历史，并以某种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描述和解释历史。海光主张人道主义史观，对当代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他认为：“在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再回顾那段已经远离了的阶级斗争年代的历史，只有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够对历史上的人和事抱有同情的理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的政治生态是相当严酷的，整人运动接连不断，越演越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几乎每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违心言行。今天的挨整者，或许就是昨天的整人者，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几乎没有，很多事情无法苛求前人。可以说是‘论迹天下无完人’。但是，即使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也有着人性和良知的底线，很多情况是可以‘论心不论迹’的。”（《磨洗与重构》）

我赞同他的观点。关于以人性诠释历史，我们有过多次交谈，达成共识。社会历史毕竟是人活动的历史，所有参与和经历已逝过程的人创造了历史。每一个在历史上活动着的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刻下了自己的印痕。因此，解读历史，最终是解释人的行为，解释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考量。人的行为当然是外部原因（社会的、自然的）作用于人的结果，但无论什么外部原因，最终要经由人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才表现出来。心理是行为的内核，行为是心理的外化。人的心理又受人性的支配和驱使，所以，以人性为本源来解读历史上人的行为，最为割切和透彻。

当然，对人性概念的理解，我与海光有所不同。关于人性，学界历来有不同界定。有人将其归结为神性，也有人理解为自然属性，还有人解释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气质和某种抽象的观念。从海光的论文看，他倾向于将人性诠释为人的正常情感和理性，即对人性作出正向意义的界定。而我以为，人的正常情感和理性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性的另一个方面是人的异常情感和非理性。人性是复杂的，不仅不同的人其人性的外化各异，而且同一个人其人性的外化也随时移世易而异。人既有善良的一面，亦有邪恶的一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此之谓也。对人性作正向意义和反向意义两个方面的综合界定，也许更能解释历史中人的种种合理和悖理的行为。不过，无论如何，海光和我都认为，比起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传统的种种因素，人性在解读历史方面更具深刻性和普适性，正如海光所说：“评判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的，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磨洗与重构》）

关于当代史的研究方法，海光也有系统的主张。《磨洗与重构》一文，就涉及了收集史料、分析史料、史实考证、学术综述、读书品书、个案研究、叙述方法等诸多问题。因为这篇序言已经不短，此处不赘，读者径读文章好了。

与海光交往，常常“聊天”，话题最多的是学术，有时“神侃海聊”，竟至午夜。每听他谈，总有收获，“思想感触点”常常被“链接”起来，如沐春风，如逢甘霖。有时观点不一致，甚至有争论，但丝毫不影响彼此的友谊。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我以为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海光能诗，偶有作品示我，我无诗才，从未唱和。“来而不往非礼也”，写下这篇拙序，算是以文“和”诗，不知海光兄以为然否？

韩 钢

2013年9月8日夜改定

序二

“多想”的智慧

我曾与王海光教授在很多学术会议上探讨过中国当代史的一些问题，交流治史的经验和体会，彼此获益匪浅。前不久，王教授来信讲他要出版一部新著作《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主旨是探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方法，邀我为他的新作撰写一篇序言，从国外学者的角度谈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当代史。他的目的是“通过点评，使青年学人对研究当代史有所兴趣，并提供一个简明的学术研究的方法路径”。

王海光的书有新意，依靠当事人笔录、原始档案记录等史料对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从50年代普通老百姓“右派言论”中反映出来的社会舆情到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党员对“三次路线斗争”的认识是怎么形成的。许多内容有待读者自己去体会。在此，我与读者分享点滴观感，鉴于无法形成严谨叙述，我还是借用陈云1981年给《人民日报》的建议，即“多搞一点一二三，搞小题……简单明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①。

1. 王海光在书中写道：“多年来，人们的观念世界被生硬地贴上了政治标签……一旦离开了这些观念术语，许多人已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了。”我谨提醒大家，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欧洲和北美也是相当普遍的。

^① 《陈云同志最近对〈人民日报〉的一些意见》，刊登于《宣传动态（选编）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王海光所点到的不仅涉及我们所使用的词汇，并且是历史学者应如何处理具体用语与史实之间的关系问题。青年学人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解释历史的名词和史实完全是两回事**。例如，“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对部分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关系特定叙述的习惯用语，用来解释中国和世界当代史上这段历史的特定概念，而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文化的大革命”发生了。正如 F. R. 安克斯密特在其《历史与比喻学：隐喻的兴衰》（1994 年）一书中说的：对历史的叙述性解释“有时会因此得名”。例如，“**冷战是一个用来解释的词，而不是史实本身**”。^① 同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解放”和“改革”也只不过是我們对中国当代史某一阶段的特定解释。

2. 我所要强调的第二点是有感于王海光对史料的识见。他一面告诫我们要防止“以政伤史，以宣传代研究”的倾向，一面强调说：“存史之学，则史实撷取、史料鉴证都是原初的工作，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懒惰或者急躁都不可取。若青年学人想有所建树，就必须细致地鉴定、选择、组织和整理史料作为分析历史的依据：**自己来掌握研究取向，勿受他人著作的影响或让档案馆、搜索服务器来替你决定！**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史元：19 世纪欧洲历史的想象》中，提出了“文学创意”的分析理路。他论证道：“史学家既要创造他的分析对象，又要预先确定他将用于解释此对象的概念方略。”^② 在中国出版的中国当代史书，很多不过是官方历史教科书的再现，而欧美有些中国当代史著作也是自觉不自觉地“着”了这类“历史教科书”的“道”，轻率地沿用了一些显然过于简单的结论。王海光写道：“尽管客观上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但学人的主观努力不够应是主要原因。”如果一篇文章百分之九十的注释都出自同一史源，那作者的独立见解的学术价值

① F. R. 安克斯密特 (F. R. Ankersmit): 《历史与比喻学：隐喻的兴衰》(*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1 页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91)。

②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史元：19 世纪欧洲历史的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31 页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1)。(中文译名《元史学：19 世纪欧洲历史的想象》，译者：陈新，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

在读者眼中恐怕会大打折扣的。

3. 王海光强调的另一特点就是不要迷信学术权威或屈服于多数人的见解：“权威者认为对的，未必是对的；多数人认为是对的，也未必是对的。”我本人一向鼓励学生向权威“提问”，对所谓“众所周知”的东西不要盲目接受！一般来说，所谓常识——包括箴言和名句的引证——不需要注明出处，但往往一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史实。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常识”的例子，经常重复于欧美学者的著作中，也自然被国际主流媒体引用。事实上，毛泽东在当时当地并没有讲过此话。虽然说，犯这些“众所周知”的常识错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治史者必须对所谓“常识”持审慎态度，从证据出发，获取真实的历史知识。正如王海光所写的：“历史的复原过程，是填补历史认识空白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历史学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发现历史的疑点，然后发掘证据予以解决之。”

4. 有必要强调的是：**人们的记忆是残缺不全的、捉摸不定的。**在这一点上，我与王海光一致，他说：“对口述史料的轻信，是非常危险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之一、过世不久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有着出于个人经验的见解。1993年在伦敦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他回顾了他是怎样开始职业生涯的：1930年代，作为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霍氏去采访英国几起政治事件的幸存者。这些事件不过是三四十年或至多五十年前发生的（等同于毛泽东的中国与今天青年学生之间的时间距离）。那次采访让他得出三个结论：

结论一，如果不是我在采访前对主题的了解比当事人的记忆更多，那些幸存者的故事便没有多大意义。结论二，在任何可以独立考证的事实上，他们的记忆并不可靠。结论三，要想说服他们改变他们头脑中那些业已成

型的错误想法，简直是徒劳^①。

我这里引用霍氏，并不是说“口述史”是根本不可信的。我不过想说：作为历史研究工作的实践活动来说，整理口述史在某种意义上往往要比研究文献史料还难。因为当事人的“口述”有时很容易起重复传说的作用。要让“口述史料”起到旁证文献的作用，能够作为阅读文献记载的必要补充，从事研究的人需要熟练地掌握这些技巧：该问什么问题，如何提出问题，以及知道如何鉴定、消化和理解他们的答案。整理口述史是治当代史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王海光强调的：“对这些乱人耳目的（口述）史料进行甄别，去伪存真，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这是当代史存史的必要工作，也是当代史学者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5. 王海光在书中几次提到“同情的理解”这个概念。在一章节中，他指出，著述历史“如果对前人的思想情感不能体会，对其行为逻辑缺乏‘同情的理解’，历史研究是无从下笔的”。在另一处，他扩展了这一观点，论述道：“只有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够对历史上的人和事抱有同情的理解。”说穿了，“同情的理解”是一个伦理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涉及如何写历史的问题。在我看来，今天欧美的年轻一代史学校佼佼者，要比他们的师长能更好地把握住“同情的理解”。但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人，喜欢把1976年之前中共上层人物囫圇说成“邪恶的化身”，而不是设身处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和当时的处境进行深入分析。当然，撰写一部好的历史绝非轻而易举，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到力求客观，有意识地摒弃那种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撰写方式。王海光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写道：“在运动中挨整的人，也未必没有整过别人。为了保护自己，出卖亲情友情，违背良心，泯灭良知，甚至落井下石，嫁祸他人，说假话，作假证的事情，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现象。‘文革’是民族的共业”。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不仅有上层领袖的事

^①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论历史》（*On History*），纽约：新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 232）。